

韩琦杂谈

兰州大学 杨 丹

摘要：韩琦，北宋重要的政治家，“当政十年有余，赞辅三朝”，“立二帝英宗、神宗”，号称贤相。他明得失、正纪纲、亲忠直、远邪佞，主张对待西夏以攻为主，曾与范仲淹、王尧臣、文彦博、赵概、吴育、包拯等同年进士赋诗饮酒，吟风弄月，以交游的方式结下了深厚情义。他也留下了许多不做雕镂、自然高雅的诗句。也曾与范仲淹、富弼等一起领导过庆历新政，他也曾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为此后人对他的评价有所不一。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，我们应该做出中肯客观的评价。本文试图就韩琦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
关键词：韩琦 交游 《安阳集》影响

韩琦（1008—1075年），字稚圭，自号赣叟，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人，北宋名臣韩国华第六子。自幼风骨秀异，天圣五年，弱冠之年举进士第二，方唱名，太史奏：“日下有五色云见，左右皆贺。释褐授将作监丞，通判淄州，入直集贤院，监左藏库。时方贵高科，多径去为显职，琦独滞筦库，众以为非宜，琦处之自若。”天资朴忠，折节下士，无贵贱，功高而不矜，位高而不骄，富贵而不侈，轻财好施，家无留货。韩琦三岁就成孤儿，由诸兄抚养，“既长，能自立，有大志气。端重寡言，不好嬉弄。性纯一，无邪曲，学问过人。”总之，他一生为官，曾授将作监丞、通判淄州，再迁太常丞、直集贤院，监坐藏库。历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、拜右司谏等。琦早有盛名，识量伟才，临事喜愠不见于色，论者以厚重比周勃，政事比姚崇。

一

当时的宋朝社会面对内忧外患，社会矛盾十分突出。作为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重臣的韩琦，虽初为谏官，但以论事直切闻名。后来他职掌要职，支持“新政”，内修政理，外御强夏，颇有政绩，与范仲淹时称“韩范”，与富弼齐名，人谓之“富韩”。在事关国家安危的皇位继承问题上，他定策安邦，通权达变，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治世风采。他晚年趋于顽固保守，力低变法，纵观韩琦一生有功有过，他死后神宗御制“两朝顾命定策元勋”碑，以资褒扬。

韩琦在担任谏官的时间内，敢于犯颜直谏，举荐贤良，刚正不阿，奖掖后进，嘉言露行，史称“凡事有不便，未尝不言，每言明得失、正纪纲、亲忠直、远邪接为急，前后七十余疏”，韩琦身为宰相，却始终以民生为念，他曾多次就边防民生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，他建议农闲练兵，战时防御，既可增强军事力量，也能减少冗兵军费。庆历三年七月，他上《论备御七事奏》，认为当务之急为：“一曰清政本，二曰念边计，三曰擢材贤，四曰备河北，五曰固河东，六曰收民心，七曰营洛邑”。韩琦一生功在社稷，时刻关心国家政治军事大事，如论减省冗费、论西夏请和、论时事、论青苗等皆正论凛然，足见其大节。韩琦在四川震灾，救济饥民、他抗夏防边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国家的忠心。他在扬州上奏朝廷，陈述利害，建议将义仓的粮食“拨与常平仓”或“赈济贫民”，以实现

义仓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目的。在定州韩琦上奏朝廷：“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，以杜戎人人寇之路。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，致边民剧然失业。今薪炭翔贵，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。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，去敌尚五、六十里，亦可广为防蔽。已别定可禁之地，揭榜谕民，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。”在并州韩琦上书朝廷，“请自今罢里正衙更差乡户衙前”。朝廷在北方诸转运使中，“相度利害，而皆所议便”，从而批准“罢诸路里正衙前”。熙宁六年二月，韩琦还判相州，第三次为官家乡，终于实现了“仕宦至将相，富贵归故乡”的愿望。熙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，然而北宋一代贤相在相州却溘然长逝，享年六十八岁，谥忠献，赠尚书令。韩琦一生“相三朝，立二帝”，欧阳修称其“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。”

二

韩琦与范仲淹都是当时的名臣，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，夏竦、韩琦、范仲淹三人意见有所分歧。韩琦持强硬立场，力主攻策，与夏军决战，认为拖延时日，财政只会日益减少，难以支撑。范仲淹则力主守议，反对贸然进攻，主张持久防御，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，乘便击讨，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。韩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，仁宗欲用攻策，执政者难之。琦言：“元昊虽倾国入寇，众不过四五万人，吾逐路重兵自为守，势分力弱，遇敌辄不支。若并出一道，鼓行而前，乘贼骄惰，破之必矣。”琦又曰：“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。”命诸将戒严。竦使人收散兵，得琦檄于褊衣带间，言罪不在琦。琦亦上章自劾，犹夺一官，知秦州，寻复之。会四路置帅以琦兼秦凤经略安抚、招讨使。庆历二年四月，与三帅皆换观察使范仲淹、庞籍、王沿不肯拜，琦独受察使不辞韩琦认为“当朝廷忧边之秋，非臣下择官之日”。韩琦的这一主张与仁宗虽然甚合，但终因朝臣沮遏，难以施行。虽然如此，韩琦在军事上的卓越见识，已经深深印在仁宗心中。在这段兵戎岁月中，韩琦时时欲建立边功，以报国恩，他与范仲淹合力御敌，深得将士信任。

另一方面，韩琦与王安石二人的相识可追溯到庆历五年，当时，韩琦因庆历新政被贬知扬州，而恰恰王安石于庆历二年中进士，被派往扬州为签书淮南判官，正好是韩琦的幕僚。

熙宁二年二月，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开始进行变法，史称“熙宁变法”或“王安石变法”。熙宁三年二月，韩琦给神宗上书亟言之。韩琦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，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，也可贷给青苗钱，这种做法根本不能“抑兼并、济困乏”，请求停止新法的实施。王安石勃然进曰：“苟从其欲，虽坊郭何害。”明日，称疾不出。当是时，新法几罢，安石复出，持前议益坚。琦又恳奏，安石下之条例司，令其属疏驳，刊石颁天下。琦申辨愈切，不克从。于是请解四路安抚使，止领一路，安石欲沮琦，即从之。

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中记载：“介甫数以古义争公事，其言迂阔，韩公多不从。及介甫知制诰，复多为韩公所沮。”由此可见，韩琦认为王安石做学问尚可，做政事不行。以致后来韩琦辞相时，神宗问道：“卿去，谁可属国者？公曰为翰林学士则有余，处辅弼之地则不可。”后来，王安石推行新法，但一开始就遭到了韩琦的强烈的反对，由于韩琦、欧阳修、富弼是前朝元老重臣，是庆历新政的骨干力量，在地主士大夫当中有很大的影响，因此，这股反对改革的逆流使得宋神宗也发生了动摇。总的说来，庆历新政中的积极分子，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，形成了以韩琦为首的集团，站在了王安石集团的对立面，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尤其是对青苗法、免役法和市易法，提出了许多批评。欧阳修指责青苗法何名济缺，只是放债取利尔。

三

韩琦及其同年的交游也对北宋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韩琦与其同年进士在饮酒赋诗、咏花弄雪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们同朝为官，情如兄弟，互相作诗，彼此唱和，故而在仕途为官中互为知己，心照不宣。如王尧臣之于韩琦，韩琦之于吴育，文彦博之于包拯、吴奎等等，此类事例，不胜枚举。例如：西夏叛乱，韩琦被派往陕西前线抵御，其部将任福因贪功冒进而兵败于好水川。战后朝廷追究败军之责，韩琦坐主帅之责，被夺去了招讨副使之职。王尧臣此时任陕西体量安抚使，为韩琦说情，后朝廷采纳他的建议，复用韩琦。宝元年间，韩琦受起居舍人、知谏院之职，但韩琦却把此职让给了吴育，他说：“臣伏见右正言、直集贤院吴育，学富识精，行醇德茂，臣今举育自代，干冒疏宸，臣无任。”文彦博对包拯、吴奎的关照及其为包拯子包拯请官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。当年，王文安公尧臣第一，今昭文相公韩朴射琦，西厅参政赵侍郎概，第二第三人也。其实天圣五年进士中，宰辅还有文彦博、吴育、包拯、吴奎。可见，王尧臣、韩琦、文彦博、吴育、赵概、包拯、吴奎他们是北宋最高的执政官员，影响着当时的朝政大局，对北宋政权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。他们平日把酒吟诗，舞文弄墨，诗文唱和不断，为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。这些都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，因为他们都是忠心报国的贤臣。

四

据南宋陈振孙的私人藏书目录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记载：“《安阳集》50卷，丞相魏国忠献公安阳韩琦稚主撰。”《四库丛书提要》载：“《安阳集》五十卷，宋韩琦撰。”而有关韩琦的事迹《宋史》本传也有记载，可见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四库丛书提要》、《宋史》都记载韩琦著有《安阳集》50卷。另外韩琦还著有《二府忠论》五卷、《谏垣存稿》三卷、《陕西奏议》五十卷、《河北奏议》三十卷、《杂奏议》三十卷等。韩琦一生写了大量诗文，大都收入安阳集，可以说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。

《安阳集》是韩琦的文集，其中诗二十卷，记、序、表、启、制词、行状、祭文、墓志等共三十卷，是研究韩琦的重要史料。李之亮、徐正英《安阳集编年笺注》对《安阳集》作了系统、

认真的文献整理工作，为学者进行韩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。然而这并非韩琦著作的全部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：“《名臣言行录》载司马光辞枢密时，琦有书与文彦博。”《东莱诗话》载：“是时亦有二书与光。”又陆游《渭南集》有“韩忠献贴跋，称西夏犯边，琦当御戎重任。后入辅帷握，陈漠画策，驾驭人才，观此帖可见，今集中亦未载入，盖编次犹有所脱遗也”。此云“盖编次犹有所脱遗”一句，颇值得深思。历来研究韩琦的著作很多，有郭琳的《浅述韩琦的对夏策略》，郭文认为韩琦对夏策略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交替使用的，大致经历了从攻、守到和策的过程。顾全芳的《韩琦论》是一篇专门探讨韩琦的著作。顾文认为韩琦早年与范仲淹等人领导过新政，晚年却反对王安石变法。韩琦在抵御西夏的入侵时，主张积极抗战。韩琦激进，却常常表现出守常。历史的复杂性及历史人物的多面性，使得人们在评价韩琦时出现许多片面之词。顾文通过对韩琦一生的几件大事的考察，对韩琦作出客观的评价，认为韩琦一生功大于过。总之，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，而韩琦的策略、思想都可以从《安阳集》中的记、序、表、启、制词、行状、祭文、墓志中映射出。

五

有人说“国朝人物，当以范文正仲淹为第一，富弼、韩琦皆不及。”也有人说“宋时称四杰者曰韩、范、富、欧阳，而韩冠其首。”清人王夫之说“韩公之才，磊落而英多，任人之所不能任、为人之所不敢为，故秉政以临险阻危疑之地，恢乎其无所疑，确乎其不可拔也。”韩琦一生富有爱国抗敌之心，正如他所说“三载于兹，寸功莫就妙”、“遂使国威重挫，梦毛益骄”。历来史学界对他有深入研究和不同的评价，苏东坡说韩琦“公准人傥，而不自贤”。苏辙也称韩“太尉以才略冠天下，天下之所恃以无忧，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。”欧阳修更赞誉韩“公之德业，固已伟然于当世矣”，“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。岂不信哉！忠彦世济其美，继登相位，宜矣。”甚至有边民歌唱到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”这些，难免有溢美的成分，但至少可以看出韩琦历史地位之重要和人们对他的敬仰。虽然韩琦有许多失误乃至错误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。王安石曾有《贺韩魏公启》一文说到：“内揆百官之众，外当万事之微。国无危疑，人以静一。周勃、霍光之于汉，能定策而终以致疑；姚崇、宋璟之于唐，善曾为理而未尝遭变。记在旧史，号为元功。未有独运庙堂，再安社稷，弼亮三世，救宁四方，崛然在诸公之先，焕乎如今日之懿。”后来韩琦去世，王安石为他作挽词二首，其中写道：“心期自与众人殊，骨相知非浅丈夫。”又：“幕府少年今白发，伤心无路送灵輶。”蔡上翔的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对此评曰：“此煌煌乎宇宙大文也，琅琅乎歌声若出金石也。魏公（韩琦）一代伟人，得此悬诸日月，可以为传为铭为赞，虽有他作，弗敢请己。”

参考文献：

- [1]（宋）韩琦：《安阳集》，巴蜀书社，2000：1199年。
- [2]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。
- [3]（宋）司马光：《涑水记闻》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。
- [4] 韩琦撰，李之亮、徐正英笺注：《安阳集编年笺注》，巴蜀书社，2000年。
- [5]（宋）《续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1957年。
- [6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。
- [7]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- [8]（明）陈邦瞻：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